

《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

【第2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

【第2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第2集/《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203-1843-3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思想史—中国—丛刊 IV. ①B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061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孙 萍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11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编委会

主 任 王伟光

副主任 张 江 高 翔 张英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卜宪群	王伟光	王建朗	王震中
方 军	方克立	邓纯东	刘庆柱
刘跃进	李红岩	李景源	李慎明
余新华	张 江	张英伟	张星星
张海鹏	武 力	卓新平	周溯源
耿云志	党圣元	高 翔	魏道儒

目 录

王伟光	高扬唯物史观旗帜,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 (代序)	(1)
王启发	从社会史到思想史:侯外庐早期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与特色	(8)
周溯源	是谁在主宰社会的治乱兴衰	(32)
周 群	弘扬红色文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45)
曹 峰	《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	(57)
王震中	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	(73)
刘 源	从鞶簋铭浅谈西周王朝三有司的任用	(83)
郑任钊	胡安国《春秋传》的复仇说	(95)
梁满仓	谢灵运与《辨宗论》	(109)
黄正建	《应正论》与唐代前期的严刑思想	(122)
汪学群	围绕着王阳明从祀孔庙所发生的思想论争	(132)
俞祖华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对“列国经验”的借鉴	(150)
郑大华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理论思考	(175)
左玉河	思想分歧与道路选择: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 论战”	(189)

李 文	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213)
辛向阳	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满生命力和活力	(230)
金民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	(240)
汪亭友	三种不同话语体系中的“民粹主义”	(254)
夏德美	东晋政教关系论战的起因、性质和影响	(263)
郑 开	道教心性学的发轫与道教世界的形成	(274)
魏道儒	文殊信仰发展的主脉	(301)
张广保	佛、道心性论比较研究	(313)
王 鹰	基督徒与佛教的“罪”与“救赎”	(346)
孙少华	汉代诸子“文道”观的思想内涵与文艺认识	(359)
刘跃进	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373)
王达敏	毛泽东与桐城派	(393)
李飞跃	命题重释、价值重估与知识重构	(405)
党圣元	新时期四十年中国文论反思:问题与导向	(417)
编后记		(436)

高扬唯物史观旗帜，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 马克思主义学派(代序)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
《中华思想通史》编委会主任)

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是《中华思想通史》项目组着力打造的高端前沿性品牌学术论坛。2015年10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首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上，我提出“构建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倡议，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学界的积极响应。今天，以《中华思想通史》项目组为主体的专家学者再次聚首，以“唯物史观视阈下的思想史研究”为主题，目的就是要在首届论坛的基础上，深化对“构建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这个命题的认识，探讨如何推动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一 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须 高扬唯物史观的伟大旗帜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理论学术的旗帜和灵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

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① 在史学研究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最紧迫的就是要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唯物史观是指引史学研究的科学指南。在史学研究领域，唯物史观“若排云雾而顿见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视廓如”（契嵩：《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使历史破天荒地置于它的基础之上，使史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唯物史观开辟了从社会存在出发对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道路，把对历史的认识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将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彻底清除出去，从而彻底地解决了历史观领域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彻底的和完备的唯物主义学说，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一道构成人类思想史上最先进、最完整、最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以折锥探地而浅地，以屋漏窥天而小天。”（契嵩：《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加强中华思想史研究，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就会流于表面，变成一纸空言，甚至走向反面。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到坚持生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经济根源是思想的本因，历史的动力是人民群众而非少数人物的创造。强调物质经济因素，强调生产力的因素，并非片面的僵死的经济决定论和庸俗唯生产力论，而是在客观地看待经济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基础作用的同时，看到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力，辩证地把握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实践与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把握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看到隐藏于偶然背后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并不是否认个人和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而是站在更加宏大的基础上，看到整体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人。诚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

^①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1版。

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导致了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化。因此，理解一定时代的阶级和阶级关系，成为理解那个时代的要枢。如果不承认奴隶社会以来的社会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承认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阉割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唯物史观就变成唯心史观了。总体上说，唯物史观清楚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历史真正动因与历史活动主体（个人、阶级、人民群众）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把握思想运动的轨迹和逻辑提供了有效的认识视野和分析方法。

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生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就是要贯彻落实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阶级分析、利益分析的基本分析方法。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思想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都发端于经济，经济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要从经济入手来分析思想为什么会产生，要分清思想站在谁的经济需求上为谁说话、为谁发声；这就从经济分析进入阶级分析，阶级分析也就是分析思想背后的阶级利益需要。以唯物史观为分析武器，就必须贯彻好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方法。一切阶级意识都是阶级利益所决定，由阶级分析进入利益分析，就能把唯物史观分析方法真正贯彻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把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主线索写清楚、写透，把中华思想的核心基因真正揭示出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二 以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挖掘中华思想的精华和核心基因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古验今,所以不惑。先揆后度,所以应卒。”(《素书》)不了解中国优秀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最新讲话,为我们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高扬唯物史观的旗帜,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分析中国思想文化,为中华思想的发展理出一条清晰、明确的脉络和主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中华思想的精华和核心基因,并结合当今时代特点实现创造性结

^①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合、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这是我们开展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中华思想的精华和核心基因,一方面要继续高度重视历史上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实践,重视历史上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创造。要特别细心搜集和整理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尤其是要注意挖掘在历史上普通中国人心中绵延几千年而不绝如缕、并在当今时代仍然发挥着作用的精神追求、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思想,既要看到历史上统治阶级思想中落后、腐朽的一面,也要注意历史上统治阶级思想在具体时代特别是上升时期的进步作用,从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当代思想文化建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可喜的是,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通史》项目组的专家学者已经从思想史研究的外围切入,渐渐抵近中华思想的核心,开始尝试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内核发起拷问与探索,希冀在遵循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发掘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提炼出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精神标识。这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任务。我们必须拿出跨越古今的气魄,来考量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在注重思想史连续性与广阔性的同时,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对接,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找到中华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原始基因和发展动力,进而在服务国家和民族的过程中,凸显中华思想的时代价值和伟大意义。

三 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是 弘扬唯物史观的重要举措

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就要高扬唯物史观的伟大旗帜,并将之真正贯彻到学科体系建设、理论学术创新、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中去。

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撰写一部经得起时间、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扛鼎之作,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举

措，也是一项光荣的学术创新工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这一伟大的学术实践中。

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做出了不少探索，但是在史料的搜集广度、理论思考的深度等方面，仍有突破和发展的空间。构建中国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学派，既要继承传统，更要勇于创新。我们绪论中的第四章专门讨论社会形态的演变，第五章讨论中华思想的流变，两者相互关照、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是我们开展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匠心独运之处，目的是通过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从中华大传统、大文化的视角，挖掘出蕴含在中华传统优秀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和核心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理论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研究群体的接续、思想的传承。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首先要求我们要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努力实现从思想史研究学者到思想家的积极转变和内涵升华。正如简单地知识归集与分析并不足以称为思想史研究一样，单纯地以思想史研究者定位为学者并不足以完整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思想接续，主动回应时代诉求，难以在更高层面开展思想探索，形成兼具“通”“贯”风格的中华思想史研究力作。“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素书》）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需要更多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需要更多将思想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勾连、对接起来的思想史家，需要更多站在思想和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哲学思考，并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提供科学的战略决策建议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要坚持为人民做学术的立场，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百余年前，史学家梁启超就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然而，悉览近百年思想史研究成果，许多都没有摆脱以精英人物为主的窠臼，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中华思想史研究、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要彻底扭转这种趋势，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唯物史观，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各个时代的思想，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思想，撰写出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思想史。

书写一部无愧于时代、人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是《中华思想通史》的目标所在。2016年,在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通史》项目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基本实现了年度的工作目标。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有两项:一是资料长编第一稿的撰写。目前各编资料长编的撰写进度不错,初步的规模在1亿字左右,只多不少。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握质量,要达到出版的标准,要经得起学界的检验。二是《绪论》初稿的撰写。绪论提纲经过多轮讨论,已在8月份的第20次工作会上通过。当时规定的目标是到年底每章不少于5万字,第五章不少于10万字。目前来看任务已基本完成。

这次会议是个新的尝试,项目组成员不仅提交论文、参加讨论,参会的编委还要做主旨报告,各编还将就项目工作进行经验交流。大家要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平台,砥砺思想,切磋交流,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为《通史》项目的顺利推进,为创建中华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而继续努力。

(本文系作者2016年12月20日在第二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从社会史到思想史：侯外庐早期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与特色

王启发

摘要：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开辟了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分门别类的思想史研究在侯外庐的研究中备受关注。作为侯外庐最早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开启了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独树一帜的从社会史到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也成为他后来一直坚持几十年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宗旨、视野与特色。

关键词：社会史 思想史 侯外庐 中国思想史

如今，当我们考察和回顾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中国学者及其成果与成就的时候，无疑会注意到侯外庐的一系列著述，以及他和合作研究者们共同著作，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概括来说，就是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同时还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侯外庐提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一方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具体的思想学说“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另一方

面又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纵通”，亦即具体思想源流的演变。^①由此可见，分门别类的思想史概念，以及相应的思想史研究，在侯外庐的研究中备受关注。

作为侯外庐最早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开启了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独树一帜的从社会史到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也成为他后来一直坚持几十年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宗旨、视野与特色。

本论将从集中介绍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两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入手，以期追根寻源，探讨其中所体现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学术发端与学术影响。

一 侯外庐早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说到何以开始对中国古代社会史进行研究，侯外庐自认为早年是受到郭沫若的相关研究的影响。在《韧的追求》一书的回忆中，侯外庐有所说明，其中讲到他早在1932年于北京任教的时候，就读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十分钦佩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划时代的贡献”。又由于当时侯外庐正在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联系到中国古史，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而且，侯外庐当时就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因此他在继续翻译《资本论》的同时，便“投入了更多的力量，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②。

1934年侯外庐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国际学社出版），在此书作者序言中有介绍说，这是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章。因为当年他在各地任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一科，有着历年积累的成稿，本来是要整理出一部可以参考的中国思想史出版，但是由于身体生病和其他事务的牵

①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66—67页。

扯未能如愿，就先将这个部分文稿单行付印。侯外庐强调说，此书所采取的方法不是叙述方法，而是研究方法，并且研究所运用的知识不是陈旧的，而是近代的，所以在书中读者“看不出一句抄袭古人的陈套，亦看不到一种流行病式的附会解释”。侯外庐还自信地说，他个人研究“老学”自然是独辟蹊径，不同于任何学者的认识路线，然而也并不是立异鸣高或趋时迎合的办法，而是来自于他个人积数年研究“老学”的一些心得。这本书分为七章，包括绪论、老子的经济思想体系、老子的国家学说、老子关于意识形态之理论、老子思想的出发点——人类性、老子的自然秩序观、老子的方法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年出版的这本书最后版权页之后附有侯外庐、王慎明合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第二册和侯外庐著《经济学之成立及其发展》两部书的出版信息，而且指明后者“为治经济思想史者很好的专门参考书”。由此可见，侯外庐首先是从经济思想入手展开中国社会与思想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研究的。

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这本书，成为后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八章《老子思想》的先行研究。在《老子思想》这一章的七个节次的标题上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后者在前者基础上的深入。如老子思想产生年代及其社会根源，老子的自然哲学，老子的知识论，老子的经济思想，老子的国家学说，老子的人性论和社会思想，评黑格尔论老子。

下面我们集中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这本书是侯外庐在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1940年到1945年间所写的史学论文集，汇编成书为14章，26万字，以《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书名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书店联合发行，1948年8月初版，大32开，337页）^①。1949年后重印过三

^① 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在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月）曾经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为《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内容只有五章的小书。“序言”写于1942年8月。从此书的目录来看，其五章的标题既包含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当中，又有所改动。其第一章“中国古典城市国家的成立与发展”（后为第五章，章下四节的标题基本一致，小有不同），第二章“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性”（后为第六章，章下三节的标题基本一致，小有不同），第三章“中国古典社会的生产方法及其亚细亚性”（后为第二章，标题有改动，章下四节的标题基本一致，并细化到三级标题），第四章“周代的商人与自由民”（后为第九章，标题和章下二节标题一致），第五章“中国古典政治与思想概说”（后为第八章并减少一节，调整到其他章次，三节标题大同小异）。

版。后来侯外庐认为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书中的内容，便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侯外庐“自序”，1946年），一些章节的标题文字名词也有些改动。其后又出版多次，最新的版本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这本书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成为人们了解、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必读书。按照侯外庐自己的说法：“本书着重在究明中国古代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只是中国古史的草图，还不是完整的古史”（“自序”，1946年）。

（一）《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研究范围与基本方法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本书所说的古代社会，从历史时间上说，实际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即今天人们常讲的中国古代王朝的殷朝末周朝初，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之际的这一时间段，有别于后来的“中古社会”。从社会形态上说，是区别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奴隶社会的性质，并且有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讲的古代“严格说即是指奴隶社会”的这一经典根据。这样的确定是由侯外庐当初写作本书时的历史认识所决定的，具有鲜明的学术时代性。在本书初版的“自序”中，侯外庐提到他的另一部著作即《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当中所列“中国古代思想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西周、春秋、战国的三个历史时期，也可以说明侯外庐在本书所讲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时间范围。

此书写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在国际学术界针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东西方文明道路问题展开论争，以及国内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展开论战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之下。在本书初版“自序”中明确提到，此书作为侯外庐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方面，侯外庐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对这一古代史理论的秘密得到了一个初步结论，因而提供给学界讨论。二是在中国古文献的考证和解释方面，侯外庐在吸收和借鉴郭沫若、王国维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主要文献材料理出了一些头绪。三是结合理论和史料的说明，以创新精神得出一个可以贯通的体系，也就是尝试将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的理论和中国古史的各方面资料结合起来。侯外庐将本书中的这三方面内容概括为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社会